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世界文学研究, 2026, 14(5), 694-701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6.145097

Hans汉斯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对《绿山墙的安妮》共生研究

昂给拉玛

内蒙古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收稿日期：2026年9月11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17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29日

摘　要

加拿大作家露西·蒙哥马利的《绿山墙的安妮》是一部经典成长小说。该作品以细腻的风景描写与令人感动的女性成长形象吸引了读者的喜爱。本文主体部分有三个章节。首先，以“理性－情感”，“公共－私密”二元论分析女性处境，发现女性处于二元结构的底层，因此安妮在“理性”社会和“公共”空间，行为举止都受到制约。接着依托“人－自然”二元论分析发现，在阿冯利镇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自然景物仅仅充当背景、被视作可供利用的工具。其次，探讨同样处境下的女性与自然彼此之间的联系，发现安妮一直在守护着身处的自然环境，自然也用绝美的景色，宽广的胸怀治愈着安妮。最后一章，则是聚焦于“文化－自然”二元结构的探讨发现，安妮历经挫折成为优秀的高知女性，自然也在安妮的灵性命名之下恢复了它的魅力。本文突破传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框架，具体聚焦于，“人－自然”，“理性与情感”，“公共与私密”以及“文化与自然”二元结构下探讨处于底层女性与自然，丰富了该理论在文学文本中的应用框架与研究案例。主人公的成长蜕变轨迹，不仅展现了女性实现独立成长的过程，也折射出女性命运与自然生态的深度联结，为女性与自然探析出突破二元结构的路径。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理性－情感”，“公共－私密”，“文化－自然”

An Ecofeminist Study of Symbiotic Relationships in *Anne of Green Gables*

Anggeilam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Received: September 11, 2026; accepted: October 17,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9, 2026

文章引用: 昂给拉玛.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对《绿山墙的安妮》共生研究[J]. 世界文学研究, 2026, 14(5): 694-701.
DOI: 10.12677/wls.2026.145097

Abstract

Anne of Green Gables **by Canadian author Lucy Maud Montgomery is a classic coming-of-age novel. With its delicate descriptions of scenery and moving portrayal of its female protagonist's growth, the work has endeared itself to readers. This paper consists of three chapters. First, it analyzes women's situation through the dualisms of "reason-emotion" and "public-private," finding that women are positioned at the bottom of the binary structure. Anne's behavior and conduct are constrained in "rational society" and "public space" by her gender and distinctive personality. Similarly, within the "man and nature" binary in 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people of Avonlea, natural scenery serves merely as a background and is treated as a tool. Second, it explor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women and nature under the same circumstances, finding that Anne has always been protect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which she lives, while nature heals Anne with its breathtaking scenery and broad embrace. The final chapter focuses on the "culture-nature" binary, finding that Anne, after experiencing setbacks, becomes an outstanding, highly educated woman, and that nature also regains its charm under Anne's spiritual naming. This paper breaks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ecofeminist literary studies. It specifically focuses on the binary structures of "man and nature", "reason and emotion," "public and private," and "culture and nature" to explore women and nature as positioned at the bottom, thereby enriching the application framework and research cases of this theory in literary texts. The protagonist's trajectory of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displays the women's self-awareness and the achievement of independent growth, but also reflects the deep connection between women's destiny and ecology. It offers a spiritual re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women's self-construction and also contributes to exploring a path for women and nature to transcend the binary structure.**

Keywords

Ecofeminism, "Reason-Emotion", "Public-Private", "Culture-Natu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作者与作品介绍

露西·蒙哥马利(1874~1942)是一位加拿大乡土文学女作家。出生于爱德华王子岛，现如今的新伦敦。幼年时因母亲去世，父亲再婚，蒙哥马利便由祖父母抚养在自然风景优美的乡下。因此，自然美景源源不断的赋予她写作灵感，她年仅九岁便创作出诗歌。1893 年她完成学业后，继续攻读教师课程获得了教师执照。1895 到 1896 年又前往戴尔豪斯大学学了一段时间的文学。1901 到 1902 年间她在哈利法克斯的两个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回到乡下。蒙哥马利也正式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她以自身成长经历以及家乡自然环境为灵感，写出了诸多优秀作品。

其中，《绿山墙的安妮》是她畅销的作品，现如今已经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畅销于全世界。主要故事情节是安妮一个 11 岁的、瘦瘦的、脸上长满雀斑的、红头发的小女孩被误认为是男孩被一对兄妹(玛修，玛丽拉)所领养。因此安妮开始了她披荆斩棘的绿山墙之旅。在这里她与自然为伴，成为彼此的灵魂伴侣。七八年过去，那个曾经有点聒噪，充满想象力，刚正不阿的安妮早已成为了一个有担当的女性。

即使最后她有机会去更发达的地方，但是为了守护绿山墙，守护曾经治愈她，给予她力量的那片土地而留在了阿冯利小镇发展。

《绿山墙的安妮》这部小说的成功离不开蒙哥马利的独特叙事。她把女性与自然的紧密连接作为小说的内核，成功塑造了安妮一位不被教条约束，果敢，积极乐观的女性角色，也表达出自然不应该成为背景板，而是具备灵性，内在价值的思想理念。

1.2. 文献综述

国内研究主要涉及自然与儿童想象、性别与主体性建构、翻译研究三个方面。在自然与儿童想象方面，刘瑞从生态儿童视角出发，揭示了安妮自我身份建构的深层机制[1]。李勉从孤童身份出发，论证了自然的治愈力量[2]。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阐明了自然对于人的疗愈功能，但多将自然视为疗愈资源，尚未充分讨论女性与自然在“理性－情感”“公共－私密”等二元结构中的共同底层位置。在性别与主体性建构方面，盛佳音与邓桂英指出，安妮在身体、语言、情感三方面受到规训，却通过命名自然、想象力、学业成就等建构主体性[3]。该研究揭示了安妮从“他者”向“主体”的蜕变，但较少结合自然生态的能动作用。徐颖与杨艳君从知识翻译学视角考察马爱农译本如何将爱德华王子岛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知识，拓展了跨文化传播研究，但未深入生态女性主义核心议题[4]。

国外研究主要围绕性别、心理创伤、翻译展开。地域与性别政治研究将文本置于具体社会语境，分析安妮如何挑战大西洋加拿大地区作为“异性恋一元化”空间的刻板想象[5]；创伤研究运用创伤理论分析其创伤症状、致伤因素及疗愈机制；翻译研究则考察印尼语、中译本的质量与认知机制，并揭示早期波兰语译本中民族主义情怀对翻译策略的影响[6]。这些成果提供了多元视角，但较少追问女性与自然如何共同受制于二元结构，以及如何通过安妮的成长与自然书写突破该结构。

总体而言，国内外研究主题虽广，但在生态女性主义研究中，安妮成长与自然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尚未得到充分阐释。现有成果多分别讨论自然疗愈、女性主体性或翻译传播，却未将“人－自然”，“理性－情感”“公共－私密”“文化－自然”四组二元结构贯通起来，考察女性与自然在其中的底层处境及超越路径。本文突破传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框架，具体聚焦这四组二元结构，探讨处于底层的女性与自然，丰富该理论在文学文本中的应用框架与研究案例。

1.3. 理论介绍

生态女性主义是聚焦于自然与女性的批评范式。它指出，环境问题就是妇女问题，必须将妇女运动与生态运动相结合，提高妇女权益并缓解环境危机，寻求可持续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观点是，揭示处于二元结构高层地位的人类与男性，认为压迫自然的意识形态与压迫女性的意识形态是同构的。该理论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主要代表人物有卡洛林 •麦茜特(1936~)，薇尔 • 普鲁姆德(1939~2008)，卡伦 • 杰 • 沃伦(1947~2020)，等等。

从众多研究者中，本文将用普鲁姆德二元论观点作为理论依据进行展开分析。普鲁姆德认为“人－自然”的二元对立是所有二元论的基础，这种二元论价值观构成了各种形态的统治：性别、种族、阶级、自然的压迫。因此在这基础上形成了“理性－情感”，“公共－私密”，“文化－自然”等二元对立因素。这四对概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了一套相互交织、相互强化的压迫体系。左侧范畴被赋予特权(等同于理性、男性)，右侧范畴则被贬低(等同于自然、女性，需要被规训)。“人－自然”(非人类)指的是人类文明(实用主义、农庄经营)对非人类自然(环境、动植物)的利用。“理性－情感”，“理性”代表秩序、克制与父权权威，“情感”则与女性、本能相连，被视为危险的“自然”。“公共－私密”，普鲁姆德指出，这是“理性－自然”二元论的变种(普鲁姆德，32)。“公共”空间由理性规则主导，监视并规

训个体，“私密空间”则被划归为女性与自然。“文化–自然”，“文化”(教育、文明)被定义为男性专属的理性领地，而女性由于被等同于“自然”(身体、生育)，被排斥在文化生产之外。

本研究将根据普里姆德批判的这四对二元论思想，从女性与自然的困境，女性与自然的同盟以及女性与自然的共生角度，探讨安妮的一路成长。

2. 女性与自然的困境

2.1. 安妮的困境

普鲁姆德在《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中指出，西方文化中相互交织的二元结构，如“理性–情感”、“公共–私密”并非孤立的观念，而是一套相互强化的压迫体系，它们通过将女性边缘化来确立主宰地位[7]。在这个体系中，“理性”与“公共”领域被赋予特权，而“情感”与“私密”领域则被贬低为需要被规训的“自然”。绿山墙所在的阿冯利社群并非纯粹的田园乌托邦，而是一个渗透着隐性权力运作与性别规范的“微观社会”[3]。因此初入绿山墙的安妮的原生态的“情感”与阿冯利崇尚的“理性”社会发生冲突，她在“公共”空间下的嬉戏也被制止。本节将以玛丽拉教育安妮，安妮被老师训诫这两个典型事件来分析安妮在“理性”和“公共”下的困境。

玛丽拉作为安妮的养母，承担着教育安妮成为“理性”世界一员的职责。想象力丰富的安妮总是自言自语，把身边的事物想象成自己脑海中的事物，有时还忘记玛丽拉布置的家务活。如此玛丽拉嫌弃的说到安妮：“她最严重缺点似乎是往往在干活中间耽于幻想，把工作忘得一干二净。”[8]玛丽拉的这种嫌弃表面上是觉得想象力没用，实则遵循着“理性”主宰社会所排斥的自然女性“情感”的一套逻辑，要求安妮务实，现实。且玛丽拉作为承接安妮——未被规训的自然情感与“理性”世界的桥梁，她深知一个女孩应当表现出克制务实才会被“理性”社会接纳，不被贬斥。

在阿冯利学校的教室这一典型的“公共”空间里，安妮的自然天性遭遇了父权“理性公共”空间的残酷审判。当吉尔伯特用“红发鬼”这种男性凝视来嘲弄她时，安妮本能地用石板砸向对方。这绝不仅仅是孩童的调皮，而是她未被规训的自然“情感”，对父权审视与冒犯的愤怒反击。然而，代表“公共理性”的菲利普斯先生却完全无视了吉尔伯特的挑衅，反而将安妮定性为“报复心极强”的危险学生，并当众罚她站在黑板前示众。在这里，“公共”空间展现了其压迫性的双重标准，男性的凝视与挑衅被合理化，而女性捍卫主体性的正当愤怒却被污名化为“报复心”。

2.2. 自然的困境

在小说中，以玛丽拉，林德太太为代表的阿冯利小镇居民身上都能看出自然被工具化，背景化的现象。而这些现象恰恰证明，“西方文明用道德二元论把自然工具化为服务于人类目的的手段。”[7]因此，人类在“人–自然”二元论中处于高层地位，一棵树木，一株花草的有价值与否都有人说了算。

小说中有一处玛丽拉回复安妮时，表现出只在乎自然的有用价值。“这是一棵大树，花开得大，可结的果子却总是不怎么样——又小又有蛀虫。”[8]这句话明显表达了玛丽拉不在乎这棵树能长成多高大、花开的多大、多好，而是以人类视角关心能接多少果子，果子是否大。

另一方面，自然以一个背景的方式出现在人类文明或活动中。甚至不被看重，不被尊重。普鲁姆德总结性的解释道：

“对自然的全面的贬低和否认在观念层面深深植根于我们对自然的背景化过程中；而且这种贬低和否认是系统性的，因而往往不易察觉。”[7]

在小说中也有多处对应的自然的背景化的描述。“孤儿院里一棵树也没有，只有门前几株瘦不拉几的破玩意儿，树干上面斑斑点点地留下刷过白灰的痕迹。”[8]从这句描述可以看出，人们为了做景观把

树栽到门前而已。这里几棵树是为了让孤儿院看着好看而被种植的景观而已。并没有考虑这几棵树栽种在此地是否影响其寿命等问题。

甚至在小说中，林德描述道：

“独自避开别人住在这种地方，也怪不得马修和玛丽拉都有点儿孤僻的味道了。树木可不是什么呱呱叫的伙伴。”[8]

在这段林德描述绿山墙农舍的话中，充分体现出林德太太讽刺地贬低自然环境。在她的观点里，住在较远的绿山墙环境之下的人会变得孤僻。她与马修玛丽拉认识几十年应该深知他们的独来独往的性格是早就有的，并不是搬去绿山墙之后才变成这种性格的。可是她武断的归咎于自然这一看法体现出在她的认知里人类高于自然，自然是次级的存在。正因如此，他才会脱口而出贬低自然的话语。

因此，在“人－自然”二元论里，自然只是工具、背景，出现在人类文明活动中，并没有体现自然本就有的价值。人类应该看到“自然本身的趣味性，益处和价值，而不是作为其他存在的手段。”[7]

3. 女性与自然同盟

3.1. 安妮对自然生灵的守护

安妮对自然生灵的守护呈现出层层递进的生命伦理。从克制自我欲望，主动约束自身行为，体察花草拥有感知痛苦的生命，拒绝肆意摧残微小的植物生灵；到怀揣精神敬畏，摒弃人类将自然当作消遣资源的功利观念，承认野生草木具备灵魂与精神归属，心怀虔诚与之共处；再到升华为切实的行动守护即将被变卖的绿山墙，体现出安妮由内在自省到精神尊崇，再到现实层面的担当，构成安妮完整且连贯的自然守护体系。

当安妮看到盛开的苹果花，禁不住要采一朵时，她反思道：

“我似乎感觉到自己不应该把它们采下来，缩短它们可爱的生命——如果我是一朵苹果花，我就不愿意被人采下来。”[8]

此时的安妮跳出人类身份，换位思考，共情于花草树木同样宝贵的生命体验，不该剥夺它们的生命、干预它们的生命旅程。小小的安妮用难能可贵的感悟守护了可爱的小生命，让它自由地生长在大自然中。

当安妮与伙伴们看到满山遍野的五月花时，其他人只顾着谁采得最多，采得最好看。然而安妮却早已站在另一个维度在想，那些生活在没有五月花的地方的人感到遗憾，并且安妮认为五月花一定是去年夏天死去的花的灵魂，而这片长满五月花的土地是他们的天堂。因此可以看出，当旁人采摘野花只为玩乐、占有自然时，安妮却看透这些野花灵魂与生命的归宿。她敬畏野生花草的圣灵身份，不愿肆意惊扰、掠夺自然生灵，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守护与尊重。

当养父去世，养母无法独自经营打算变卖绿山墙农舍之时，即将攻读大学的安妮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决定亲自打理绿山墙农舍，并守护给予她无尽的欢乐，见证她成长的地方。她也深知一旦绿山墙被卖掉之后，自己也没有理由去阿冯利小镇，更残忍的是绿山墙很有可能会被用来开垦种地彻底变成仅为经济价值而存在的土地。所以她决定留在绿山墙和它共生存。因为在安妮心中，绿山墙不是可交易的房产土地，是有温度、有记忆、陪伴她成长的自然生灵。

安妮将自然万物视作拥有灵魂的生灵，突破“人－自然”二元逻辑，共情天地生灵。三段事例层层递进，展现她从善待草木到以实际行动守护承载生命记忆的自然栖居地的完整历程。

3.2. 自然对安妮的精神疗愈

自然与女性都处于普鲁姆德批判的等级二元论的低层。正因如此，受制下的自然与女性之间产生了更深层的亲密联结。安妮凭借想象为自然景物赋予贴切的名字，以此诠释自然独有的灵性与价值。而自

然包容万象，静静聆听安妮心底最真挚的思绪，成为她成长荆棘路上宽厚温柔的疗愈者。

当安妮在担忧自己是否能被收养之时，绿山墙的早晨以闪烁光芒治愈安妮感到绝望的心。她坦言道“因为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容易振奋起来，也容易在忧愁的折磨下毫不气馁。”[8]安妮满怀期待的终于有一个家了，但因为是一个女孩要被送回孤儿院时失望至极，感到无比痛苦。可是第二天，绿山墙阳光明媚的早晨给予她接受现实的勇气，也悄悄孕育出一份韧性，让她明白遭遇困境不必沉溺失落，拥有直面挫折、不轻言悲观的平和心态。

当安妮得知将与同龄的戴安娜见面，并可能会成为好朋友时，窗前的那颗樱桃树——“白雪皇后”以繁花承接了安妮满心期待与无比紧张的情绪。安妮对着它絮絮说着心底翻涌的期待，吐露害怕自己不被戴安娜喜欢的担忧和无法相处娱乐的不安。微风拂过，樱桃树那洁白花枝轻轻摇曳，仿佛像一位安静的老友正耐心聆听安妮所有心绪，并默默包容少女无处安放的欢喜与紧张。

当安妮为考试忧虑重重之时，夏日黄昏的美景，空中弥漫的花香，在风中摇曳的白杨树让她暂时忘记考试的痛苦。还有“那栗子树上绽出的嫩芽的街道尽头回荡着的蓝色雾气时，考试就似乎不那么叫人牵肠挂肚了。”[8]绿山墙的风景从视觉，味觉，与听觉多方位让安妮陶醉于自然的魅力，让感官与自然产生亲密联结，因而为她缓解考试带来的那份紧张与焦虑。

自然从不会吝啬它的治愈力量，在安妮的成长路上始终坚定地陪伴着她，以温柔拥抱每一次受伤的心灵。让安妮褪去生活的浮躁与焦虑，在自然的肌理中安放情绪、沉淀自我，接纳不完美并直面成功路上的挫折。

4. 女性与自然的共生

4.1. 安妮主体性的成长

普鲁姆德指出，在西方传统的二元结构中，“文化”与“理性”往往被划归为男性的专属领地，而“自然”则与女性紧密相连，被视为需要被规训、被教导的客体[7]。在传统社会里，男性由于被认为更具“理性”，因此天然的接受教育，而女性只能囿于家庭与生育。在《绿山墙的安妮》中，安妮不再像年少时那样非此即彼地对抗所有事物，并成为了阿冯利镇最高学历的人。安妮打破了“理性”是男性独有的逻辑，实现了“理性与情感”给予一身的女性。她与吉尔伯特的多年恩怨，随着两人考入同一所高中，并怀揣同样的教书梦想，吉尔伯特自愿让出教职的举动，打破了安妮的偏见。她也因此明白了世间并无绝对之事。安妮原谅吉尔伯特的行为并不是一种妥协，而是她那曾经的感性，如今升华为共情与包容的成熟“理性”。从而传达出真正的“理性”并非是男性的专属，真正的“情感”也并非女性独有，每一个人都是真正的“理性”与自然“情感”的共同体的理念。

另一方面，安妮作为一名女性，却展现出对文化知识热烈的追求。她凭借自身的天赋与不懈的努力，最终考入女王学院，甚至获得了去雷德蒙德大学深造的奖学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知女性。安妮的成功不仅是个人命运的逆袭，更具有深刻的生态女性意义。她以无可辩驳的学识证明，女性(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完全有能力掌握并创造“文化”，她没有被父权社会同化为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而是通过追求学时构建起了独立的主体性。安妮的存在，彻底打破了“女性智力劣于男性”“女性无需参与智力活动”等偏见长期存在[3]。更是证明了“自然”不仅可以跨入“文化”的领地，更可以成为“文化”卓越的建设者。

故事的结局，安妮回顾自己的一路坦言道：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获得或争取任何东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尽管远大的包袱是可贵的，但目的并不能够轻易达到，要经过辛勤劳动、自我克制、焦虑不安和灰心丧气的层层考验。”[8]

通过安妮对自己的总结，更切实地证明曾经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成长为思想独立，理解世间万物、学识渊博的优秀女性。

4.2. 成长确证之自然的复魅

在普鲁姆德的批判的“人－自然”二元论中，“自然世界和生态系统被看成是无足轻重的领域，是人类文明可以忽略的、无关紧要的、它们只是环境和舞台。”[7]因此在人与自然二元论中自然的内在生命体验被遮蔽，以工具化，背景化存在。在《绿山墙的安妮》小说中很多景物被赋予世俗的称呼而安妮通过重新命名让周围的自然景物释放它们的魅力。

第一处，安妮把“林荫道”改成“白色欢乐之路”。她说道：“他们不应该管那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叫林荫道呀。这类名字毫无意义。他们应该管他叫——‘白色欢乐之路’。”[8]“林荫道”叫为“白色欢乐之路”，这两个名称承载着截然不同的意义。“林荫道”是在人类在利益视角下起的名字。这个称呼下那条路只充当着供人们乘凉的地的角色。相反“白色欢乐之路”这个名称是从人与自然更深层的联系出发，承载着自然给予人类心灵上的一种愉悦，每当有人走过这条路都会让人感到愉悦感。

第二处，安妮把“巴里的池塘”重新命名为“闪光的小湖”。“巴里的池塘”带着强烈的所属性，表明池塘属于巴里家，它并没有自主性。然而，在安妮看来，它应该叫“闪光的小湖”。因为在安妮的视角下它多姿多彩，闪闪发光的，她把观察到的、感受到的池塘本身魅力并以此命名了它。在她眼中，湖水从不是普通的池水，而是揉碎了霞光与绿意的珍宝，安妮的这份温柔感知，也让平凡的池塘重新拥有了浪漫鲜活的灵魂。

第三处，她给窗外的樱桃树起名为“白雪皇后”，在安妮的视角下，这棵普通的樱桃树变成了高贵的“白雪皇后”。在“樱桃树”名称的背后，“表达了人类对于自然不可置信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的麻木。”[7]樱桃树有很多，可他们不关心，只在乎这是一棵能结樱桃的树。而安妮敏锐地捕捉到了白雪般盛开的花朵与高耸的树身，并将其命名。而这棵樱桃树也在安妮的命名下，好似花开不败，魅力无限。

安妮的自然命名行为，绝非传统意义上人类对自然万物的主导性定义与规训，而是以平等共情的伙伴姿态，为每一处自然景物赋予专属且充满诗意的“身份标识”。[1]安妮以纯粹敏捷的心去命名自然、诉说出自然本真的、细碎的美好。自然也在安妮的命名中得以恢复它本来的魅力。

5. 结语

本文聚焦于加拿大作家露西·蒙哥马利的《绿山墙的安妮》这部小说，运用生态女性主义中“人－自然”，“理性－情感”，“公共－私密”，“文化－自然”四对二元结构分析主人公安妮·雪莉的成长之路以及自然的复魅。

研究有三大发现，其一，19 世纪的女性与自然的困境。以安妮为代表的女性，从小就受到来自父权“理性”社会，“公共”空间的规训。安妮因反驳他人挖苦自己长相而被视为不克制自然“情感”表达的女性、因在教室“公共”空间反击他人的当众取笑而被菲利普斯先生扣上了报复心强的帽子。自然也同样遭受到了“人－自然”二元逻辑的贬低。小说中，阿冯利镇居民的视角下，自然景物只是背景与工具。他们只在乎花草树木能带来的有用价值，而非感知自然的内在价值。

其二，正是因为女性与自然相同的处境，彼此之间产生了亲密的联结。安妮以赤诚的心守护自然生灵，自然也反向治愈安妮的内心。其三，女性与自然都走向了更美好的未来。安妮历经大大小小的事件，突破“文化－自然”的二元逻辑成长为一位人格独立不依附于他人、积极向上、不断自我完善的高知女性。自然景物也在安妮的守护与灵性的命名之下，让更多人注意到了自然的魅力。

蒙哥马利以自身成长为灵感塑造了不折不扣的女性形象，传达出女性可以是千千万万个样子的超前

思想。并以自然描述体现出生态与女性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本文拓展了该作品研究角度，充实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框架。安妮的成长历程传达了女性要勇敢摆脱“理性－情感”，“公共－私密”，“文化－自然”的二元结构逻辑，才能活出自我的意识。

参考文献

[1] 刘瑞. 命名自然与建构自我: 《绿山墙的安妮》中的儿童生态想象研究[J]. 长江小说鉴赏, 2026(19): 95-98.

[2] 李勉.《绿山墙的安妮》中的孤童身份与自然美学[J]. 海外英语, 2023(11): 209-211.

[3] 盛佳音, 邓桂英. 从“他者”到“主体”: 《绿山墙的安妮》中的女性主义成长叙事[J]. 长江小说鉴赏, 2026(10): 53-57.

[4] 徐颖, 杨艳君.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绿山墙的安妮》马爱农汉译本分析[J]. 嘉应文学, 2025(22): 92-94.

[5] Fan, K. and Bai, W. (2023) A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Annie of Green Gab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6**, 164-172. https://doi.org/10.32996/ijllt.2023.6.12.19

[6] Beata, P. (2022) Sophisticating the Image of Avonlea in the Earliest Polish Translation of Anne of Green Gables by Lucy Maud Montgomery. *Perspectives*, **30**, 209-223. https://doi.org/10.1080/0907676X.2021.1900882

[7] 普鲁姆德. 《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M]. 马天杰, 李丽丽,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

[8]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绿山墙的安妮》[M]. 马爱农,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